



容闳与留学生事业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祖籍安徽安庆,后迁居广东香山(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中国改良主义的创始人,是美国化的中国人,主张民主共和。他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政治救国为己任,谋求中国社会的革新。其中以开创留学教育之先河为最突出的贡献。作为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容闳首创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43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容闳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得不记住的名字。100多年前,正是因为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第一次向中国人表达敬意。此后,由他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第一次得以正视西方教育,并受其教益。容闳被后人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容闳幼年生活在广东的南屏镇,那里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6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马礼逊教会学校学习。

马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士马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布朗先生是一个美国人,为耶鲁大学1832年



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花费心血去教育他们。在教育教学中,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学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的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4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已经初步想好了以后做什么。他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和他一样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走向文明而强大。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100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



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与之相比的。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待“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直到1870年春,他恳请向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才经曾国藩转达朝廷,并最终得到批准。此后,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

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1875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进入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此时,未满19岁的容闳,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容闳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容闳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他在美国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做到半夜。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荷,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



在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取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

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国藩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国藩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国藩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前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将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



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三批 90 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着,120 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的大门。这 120 名幼童大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万里以外的新大陆。当他们从美国西部乘火车去东部的时候,幼童们欢呼雀跃,高兴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着羽毛的奇装异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们更无法抑制心中的愉悦之情。到达东部城市哈特福特后,一系列困难就接踵而来,幼童们兴奋的心情顷刻挥之而去。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星期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给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现存的幼童们写的一些作文,可以发现他们那时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幼童们到美国,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学生活。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可以进学校学习了,清朝官吏对他们的管制也相对减少了。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加上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他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很多美国学生也喜欢和他们交朋友。幼童们初来美国时那种生活上的困惑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人聪明好学、刻苦奋斗的天性,使这批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有的因为用功过度,常常病倒,有三位积



劳成疾,客死美国。比起在国内求学来,这些幼童的负担要重得多。除了繁重的功课外,他们还要接受中文教育。到1880年,多数幼童已经中学毕业,个别的如詹天佑等考入了大学,还有一些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机一天天在增加。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特别是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甚至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为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清廷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还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了,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利、自由、民主十分迷恋。个别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划船队,曾多次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队。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学东渐记》里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



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踉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但是,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最后不得以 1881 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

按照容闳的本意,是让留美学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坚持百年,就能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批高级人才。为此,他恳请清政府批准,斥资 4.3 万美元,在哈特福特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作为选派和管理留学生的办公用房。1875 年楼房竣工后,容闳等人就搬入此楼办公,同时还有一些专供住宿的宿舍和学习汉语的教室,幼童们可以定时来这里上中文课。这大大便利了留学生的培养。但万万没有想到,由于政见不同,这座楼成了领导留学生的这些清廷官僚经常吵架的场所。由于清廷对容闳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让他担任留美学生副监督,遇到好多重大问题还是由监督说了算。

1876 年,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容闳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吴子登支持洋务事业,还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思想开放度不高,行为古怪,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引起多数留美学生的不满。他尤其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两人回国。这两名幼童不愿回国,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转往异地上学,后来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最后在幼童们的心里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容、吴两人常常吵翻,很少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令人不安的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而容闳毕竟不大懂中国政治,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给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这样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所以当 1881 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获得批准。于是,吴子登下令,所有幼童从 1881 年 8 月 21 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无论是对容闳,还是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人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据有关研究人员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多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容闳坚持民族立场,处处维护国家的利益。在投身洋务运动的20多年中,他一直把组织青少年出国留学,培养中国科技人才,当做毕生追求的救国理想。我们回顾一下:1867年他将留学教育计划呈总理衙门,没有得到答复。1870年他再次与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次年即获朝廷批准:自1872年到1875年分4批共120名学童(其中40名为香山县幼童)赴美留学,由陈兰彬、容闳分别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1875年,陈兰彬、容闳分别任中国驻美正副公使,容闳兼管留学生事务。1881年,因清廷保守派的反对,留学生事务所被撤销。其时,在赴美的120名幼童中,除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大学正式毕业外,其余尚在大中学校学习,不得已终止学业回国。容闳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被迫终止。令人欣慰的是,120名学生回国后都能洁身自好,为国争光。在20世纪初期,这批留美学生为中国的铁路、外交、邮政、电报、海关、国防及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10年(宣统二年),容闳曾邀孙中山赴美商谈,表示支持革命。

1912年4月12日,容闳在美国逝世,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



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他对身边的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国吧!”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均作了报道。美国人评价容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容闳死后葬于美国康涅狄克州哈特福特城。

为纪念容闳对祖国的杰出贡献,上海交通大学建筑了容闳纪念堂,家乡珠海市举办了他的诞辰纪念活动,并塑立了纪念雕像。在美国,耶鲁大学、康州哈城、纽约先后分别为纪念容闳举行集会、建立纪念碑和容闳公立小学;他的画像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悬挂在耶鲁校园,一起受学生瞻仰。

容闳首创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